

术协助下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这些新组织不同于西方式政党,也不同于列宁式的小组,它们有的是得到国外基金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只是善于利用网络工具的年轻人。网络与“脸谱”、“推特”等新型信息工具的结合,轻易实现了大量信息实时的平面传播,这就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的运动得以在瞬间完成。这些善于利用信息技术的新型组织,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以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表达个人政治诉求、与他人进行广泛交流的媒体。这些技术工具可以广泛传播类似“够了”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在短时间营造新的社会共识,实现对特定政治人物和特定目标的聚焦式压力。这些新信息技术还可以迅速消除原有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契约,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网络中平等的节点,瓦解金字塔结构的传统“主控”社会,造成“技术性无政府现象”。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政治理念不同,这次政治动荡借助于新技术工具,已经展现出“一切人影响一切人”的现代政治特征。这场运动预示着金钱与暴力构成的传统政治权力正在被信息技术解构,信息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结合可能构成了未来社会权力新结构。由哲学理念、价值观、社会意识、概念创意等精神要素建构的“政治软件”,将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政府、政

党及其领导人如果不理解当代信息技术对政治正在产生的深刻影响,就会丧失编制“政治软件”的主导权,将在网络政治的对决中溃败。

通过对上述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引起此次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根源尚未消除。阿拉伯国家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随领导人更换而化解,社会动荡有可能成为长期的动乱,因动乱引起的石油价格上涨会把危机向制造业国家和消费型经济传导,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甚至把全球拖入经济滞胀的泥潭。因此,危机将继续深化,世界已进入动荡期。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的抗议活动证明,所有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同时,这亦证明新技术开启了社会运动的“潘多拉盒子”,将是对所有国家社会治理的新考验。

就像在经济领域,我们现在既要懂得实体经济,也要重视虚拟经济。同样,在政治领域,我们要解决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反腐败等实体政治中的问题,也要关注网络、电讯等虚拟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就像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有破解动乱发生原因的认识能力,也需要有把发生动荡的道理说清楚的本领。○

## 当前中东剧变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发生在突尼斯西部一个小城镇的一起城管粗暴执法事件,竟然在中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连串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或倒台或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不能不发人深思。综合研判可以发现,这场剧变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是阿拉伯世界寻求民族复兴的一次新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拉伯世界深陷危机,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干涉频繁,先有英法殖民,后又呈美苏对抗,但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放弃寻求民族复

兴的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民族民主革命”席卷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曾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大国(埃及)和伟大领袖(纳赛尔)身上,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曾经盛极一时。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又掀起了“伊斯兰复兴”浪潮,阿拉伯人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出路。但两次复兴的尝试均未引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这次以突尼斯、埃及“社会革命”为标志的阿拉伯剧变是阿拉伯复兴的第三轮探索。

目前的中东剧变源自独特的“阿拉伯病”。历史上阿拉伯、印度、波斯、中华并称人类四大古老文明,如今中国、印度、伊朗已先后摆脱历史阴影,走在民族复兴自强的道路上,而阿拉伯世界仍停滞不前,被世界经济全球化远远地抛在后面。政治上,阿拉伯国家仍然沿袭家族统治、个人独裁、君主世袭、子承父业,几十年保持一成不变的统治模式;经济上,结构畸形、体制僵化、政府巨额补贴,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日趋边缘化;外交上,饱受屈辱,22个阿拉伯国家敌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频频遭受西方双重标准和武力干涉及民主化改造的羞辱。“9·11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更是把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妖魔化。阿拉伯世界社会问题成堆,分配严重不

公,人口快速增长,青年失业率奇高(30% - 50%)。阿拉伯世界的残酷现实使阿拉伯精英痛心疾首,纷纷呼吁新的“复兴运动”。阿盟秘书长穆萨就曾疾呼:“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希望。”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东变局可视为阿拉伯国家迷茫屈辱、绝望情绪长期淤积的一次总爆发。它的发生虽有外部力量刺激和助推(如网络新技术、金融危机、美“中东民主计划”等),但具有相当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是阿拉伯社会内在矛盾累积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次剧变主要在阿拉伯世界范围,世界其他地区虽也会受到一些波及,但属“借风扬土”,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 中东乱局的成因及其影响\*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个年轻小贩因不满警察扣押自焚于当地县政府门前,此事经社交网站“脸谱”传播后,立刻激起突尼斯民愤,并最终导致激烈街头运动,致使总统下台。此后,中东地区多国相继爆发类似事件,特别是掌权埃及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总统被迫下台更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一震。但由于事发突然,并且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之中,所以不宜过早对局势做出结论。目前可以判断的只是引发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与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不同,并非大国策划推动,而是国内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经济原因。事件发生国政府应对全球化不力,经济发展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值得注意的是,突尼斯、埃及1978-200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07%、4.52%,排名世界第12和19位。在这样的经济成就下依然爆发了激烈街头政治运动,说明其经济增长本身蕴含问题,即经济总量增长,但质量低下,所以遇到外部经济冲击便会陷入困境。加之发生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全球市场需求锐减,由此带来石油价格和旅游人数大幅下降,使

得此次事件当事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这说明,尽管曾经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这些国家并未就应对全球化挑战做好准备,包括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增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等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没有使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是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而这又与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第二,政治原因。此次事件发生国普遍具有半开放性特点,同时面临国内强人统治下的恶性腐败和国际社会干预的双重压力。此次被推翻下台的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因长期统治而在国内积累了严重的家族腐败问题,由此导致经济增长成果无法惠及百姓,从而逐渐失去民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普遍具有半开放性特点,即对内施行强人统治,对外又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突尼斯就积极参与了法国推动的地中海联盟合作,埃及也是推动中东和平的重要国家。在此背景下,主导国际社会的西方价值观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国家的青年,增强其对本国强人政治的不满。另外,西方价值观中对于军

\* 本文第二作者康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博士生。